

《“如果鲁迅活着……”——一个常青的历史话题》概论

商昌宝

自 1936 年鲁迅死后,“如果鲁迅活着……”这个带有虚拟性的话题便不时地为人们提起,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各自的特点,真可谓与时俱进了。特别是新世纪初年,因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披露“毛罗对话”引发的反响,陈明远主编了《假如鲁迅还活着》一书,更极大地推动了这一话题的深入及被广泛关注。然而,当我们认真追溯和回看这一问题时,仍会为那其中存在的诸多空白和空间感到惊奇,拙作《“如果鲁迅活着……”——一个常青的历史话题》即是应这样的学术需求而产生。为了更好地诠释这样一个复杂、沉重的话题,特别是在当下鲁迅不断被质疑、批判、贬低、移除的大潮下,有必要先行拟出一个“概论”投石问路,以就教于学界前辈和同行专家,希冀在将来的著作中有所帮助和指导。

—

关于“如果鲁迅活着……”这一历史话题,据笔者有限的考证,最早提及的人是胡风。1941 年 10 月 7 日深夜,在鲁迅逝世五周年时,也是中日战争进入白热化时期,避居香港的胡风作了《如果现在他还活着——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的文章,发表于 10

月 18 日香港的《大众生活》周刊第 23 号上。在这篇通信中,胡风写道:

战争爆发以后,大家都被卷进了其大无边的兴奋里面,特别是热情而纯洁的青年人,……我间或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如果鲁迅先生还在,该多么高兴啊?

或者

——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你想他是怎样的情形呢?

显然,胡风是在陈述一段历史事实,即中日开战初期国人普遍憧憬战争胜利,自由、光明即将到来,一切黑暗、污秽都成为过去,甚至为鲁迅过早亡去无法分享这一幸福时刻而惋惜。在这样一种一厢情愿和盲目乐观中,胡风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如果真的他还活着,恐怕有人要把他当作汉奸看待的。^①

胡风的回答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将鲁迅与汉奸相联系是有渊源的。如早在鲁迅剃发归国之初,便被斥骂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②1920 年代,爱罗先珂发表批评中国缺点的文章后,就被指为是鲁迅授意,还说鲁迅“之叛国”,是因为其“女人是日妇”。^③接着是 1934 年上海的《社会新闻》第

7 卷第 12 期刊有一篇署名“思”的文章,标题就是《鲁迅愿做汉奸》。针对这样的流言蜚语,鲁迅当年虽然作了各种辩诬,但是关于其与日本人的各种流言蜚语和之后广为流布的“拿卢布”之说,仍是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及至世纪之交,张宽、朱大可、冯骥才、摩罗、敬文东以及赵无眠等^④又出来摇旗呐喊、擂鼓助阵,不知道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鲁迅当年曾说过“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⑤当然这些人将鲁迅与汉奸、殖民地相联系的主要是因为中日民族矛盾高涨时,鲁迅仍不忘批评代表国家的执政府及其文人们的劣根性,并刻意提醒国民勿轻易相信所谓的爱国动员和宣传。这一点,在鲁迅那里是属实的。如他在《且介亭杂文未编·半夏小集》中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⑥这样的话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大陆中国,都是不能承受的。因为对于几百上千年来“家天下”体制造成的特别国情与国民,大概迄今都没有几个人能搞清何为“爱”?何为“国”?虽然陈独秀早说过“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什么。……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⑦不错,如果鲁迅真活着,即使是面对民族救亡和全民抗战的大背景,如果国家或政府等“强有力”不珍惜民众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平等的权利,或者不给予必要的训练就组织其对抗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或者教化他们为了掩护一个所谓抗战军人而甘愿献出生命,或者以国家的名义饱以横征暴敛、强占民财、强买强卖强拆等野蛮行径等,是说出那些“难听”话的。同时,他也会因为那些只知有国家、民族、政府、集体而不知有个人,只知空喊

“一致对外”、“同胞同胞”而不知自己身已为奴或已奴在心而不自知的普通民众,只知保存国粹、传统文化、中国特色而不知保存自己的文化论者,说出那些逆耳话,因为他同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人一样,都认为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⑧

二

在鲁迅逝世 10 周年和中日民族战争已宣告结束、国内政党开始角逐那把“旧椅子”之际,“鲁迅如果活着……”的话题被重新提起。1946 年 10 月 15 日,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第 3 卷第 4 期上推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特辑”,并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为题,组织了茅盾、田汉、熊佛西等 15 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的笔会。受邀之人多来自左翼或革命作家,文章自然是人们所熟悉的那一套。如熊佛西回答说,鲁迅必然要呼吁:反对内战;要求美军即日退出中国;要求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要求实现增写的决议案;警惕我们防止帝国主义的再抬头;继续肃清法西斯蒂的细菌。田汉认为,鲁迅会要检举汉奸的工作许做得更彻底,而民族正义更得伸张;反对内战;反对今天美国的世界政策、特别是他的对华政策。茅盾、周而复都判断,鲁迅会认为抗战后,中国将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的危险却比以前更甚。任钧、施蛰存、萧乾都认为,鲁迅会像李公朴、闻一多一样被刺。安娥、王西彦、罗红都认为,鲁迅会坚决呐喊,绝不彷徨。

基于上述各种假设,可以作出一些符合逻辑的推断。比如追求自由、反对内战、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是符合鲁迅一直坚持的普世的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的。面对可能发生的内战,他也是要考证一下交战双方的职责问题。因为,毕竟都是中国人,每个个体生命,不能因为领袖的意见不一,就动辄以枪杆子决定胜负,这是野蛮国家的前现代行为;

针对美军是否即刻撤出中国的问题,鲁迅应该会赞同美军撤出中国,但在时间的要求上是否也那么急促则是一个问题,因为只要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真正结束一场战争(包括对战败方的接收)是复杂、渐进的,不能不负责任地一哄而散、拔腿就走。况且,鲁迅应该也能判断出,作为大力支持中国抗战并付出沉重代价的友军和盟国——与敌对方的日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美国等应该无意长期占据一个已经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国家,除非当时的中国政府有特别需要。而且,截止1946年,1840年以来的各届政府被迫签订的治外法权、关税自主等不平等条约,均已各种不同方式终止,中国人民已真正“站起来了”;针对检举汉奸的问题,鲁迅应该会对那些确有卖国行为的人士进行声讨,尤其是那些嘴上口号喊得震天响背地里却偷鸡摸狗之徒,但绝不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不分缘由地构陷别人抬高自己,因为他早在《流氓的变迁》中指斥过那个劫法场的李逵“抡板斧排头砍去”^⑨。或如邵燕祥在《鲁迅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中所说“他不能容忍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滥施挞伐,滥泼污水”^⑩;至于是否要挨打或死亡的问题,这的确是很难判断的。因为一方面,鲁迅推崇的是“壕堑战”、“散兵战”以及韧性战斗,反对赤膊上阵,与李公朴、闻一多那样的激进、高调相比,会相对安全一些。这一点从他过往的多次经验来看,也可以确证;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走上街头(或在家里也一样),凭鲁迅的声望和影响,如果有需要,也很可以造成一种被打或死亡的结果。当然,这取决于“棋局”而非鲁迅本人了。

三

1949年,新政权诞生之初,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一本苏东编校由大众图书公司出版的名为《鲁迅先生笑了》的书应运而生。书中收录了包括毛泽东、法捷耶夫、陈伯达、

茅盾、周扬、许广平等的32人的纪念文章。翻看目录可知,书名取自书中收录的郭沫若文章。在这篇慷慨激昂的纪实性分行散文抑或是诗作中,郭沫若以他一贯的抒情风格想象了鲁迅如果活着的各种“笑”:看到在西苑飞机场人群迎接和欢呼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而笑;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拥护和平大会”上看到全体代表为南京克复欢呼“新中国万岁,毛泽东万岁”时而笑;在先农坛公共体育场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纪念大会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时而笑;在中南海怀仁堂文代会代表们在毛泽东莅临会场欢呼“毛主席万岁”时而笑;在中南海怀仁堂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后而笑;在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新政府成立典礼全场欢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时而笑。

面对1949年的历史转折时刻,郭沫若大概的确是笑声不止,因为多年追求的主义和理想已经初步实现,尽管这主义和理想——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是个问题。再就是,对于一直以来深怀屈原情节的郭沫若来说,1949年后一步跃升至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文联主席等高位,可以说是实现了传统文人的“学而优则仕”、“为帝王师”的文化梦想。但在鲁迅那里会如何呢?肯定性的评判——即如郭沫若所畅想的那样会经常笑口常开——存在可能,而做出否定性的结论同样更可能。因为,鲁迅早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就说“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⑪他还说过“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⑫所以,鲁迅如果等到所谓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他可能会笑,会“献诗作赋,‘俳优蓄之’”,也可能做司马相如,称病在家作“关于封禅的文章”^⑬,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依然会紧锁眉头,然后拿起那只习惯写

黑暗的杂文的笔。当然,如果鲁迅活着并看见“越来越浅白庸俗,做士大夫,好名,要继承鲁迅而为文化班头”^⑭——郭沫若的这段文字,他倒是真的可能会笑,不过只能是嘲笑和冷笑。

除郭沫若外,还有人提出过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据牛汉转述说“1949 或 1950 年,周作人写信问《人民日报》文艺部: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首先要改造思想,再根据改造的情况分配适当工作。”^⑮郭沫若这样的答复,显然是符合 1949 年后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界、文化界的思想改造主题,也与 1949 年后的实际历史相符合。作为被改造者的鲁迅该如何呢?是否会如所愿“听将令”,如郭沫若、茅盾等那样主动配合,撰写大量配合时事政治的思想检讨^⑯;还是被动应付自甘边缘,携胡风、路翎等“七月”同人以及不受待见的冯雪峰、萧军等一旁围观;还是继续做独立的自由撰稿人,坚守人道主义和不做任何人的奴才的底线?恐怕难于确切回答。不过有两点可以明确,一是其自由撰稿人身份无法保证,因为整个新中国的饭碗都划归公有,想要吃饭,就得靠近或委身于体制和权力,或者只能如他的弟弟周作人一样靠“公家”的施舍;二是抗争无效,被打入另册,像胡风等一样被搁浅或流放。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因为 1942 年胡乔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反驳萧军“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等论调说“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而革命领袖“毛主席非常高兴”,邀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⑰当然,对于 1949 年那样的结局,鲁迅是有理性预判的,即如 1928 年在《“醉眼”中的朦胧》中所说“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即列宁——引者注)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

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⑱鲁迅还对冯雪峰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到上海时,首先就要杀我吧!”^⑲所以,在 1949 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鲁迅应该知道何去何从,他是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

四

“如果鲁迅活着的……”的话题在 1957 年被再次提及,而且来自最高统帅毛泽东。3 月 8 日,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毛泽东这样说道“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⑳3 月 10 日,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又说“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㉑3 月 12 日,毛泽东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说道“鲁迅的杂文是对敌人的,鲁迅对付敌人的锋芒可不可以用来对付我们自己内部呢?据我看也可以,假使鲁迅还在,他就要转过来对付我们的缺点、错误。”^㉒

必须承认,新政权最高领袖在“反右”前的这几段话确是很值得研究。如果鲁迅活着是否会如毛泽东所言充当急先锋?在对这个问题作出确切回答前,不妨先翻看些鲁迅过往的言论。他曾在演讲中说过“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㉓稍早前他在另一次演讲中也说过“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㉔鲁迅还说过“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

诅咒的时代!”^{②5}可见,鲁迅如果活着,是可能会说出一些颠覆性而非建设性的话语。当然,也可以得出鲁迅不说话的结论。因为在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胡风反革命事件”后,鲁迅应该能够判断出所谓“双百方针”及“整风运动”背后的意图。邵燕祥在《鲁迅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中说“鲁迅是深沉的。他最懂得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在一个历史大转变的关头,鲁迅恐怕不会止于一鳞一爪,而会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②6}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延伸思考,那就是依照毛泽东的论断,如果鲁迅活着并在大鸣大放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结果会怎样呢?关于这一问题,随着2001年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出版,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确切答复——“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②7}此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起思想文化界的轩然大波。谢泳、陈晋、秋石、薛克智等纷纷撰写质疑文章,贺圣谟、陈焜、何满子、靳树鹏、黄宗英等人又先后站出来支持或作证。尤其是黄宗英作为当年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其文可以说是证据确凿,事实清楚。^{②8}

其实,关于“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在很多当事人那里,都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如据茅盾的儿子韦韬讲,1960年代初,茅盾在与家人闲聊说起鲁迅在1930年代如何嫉恶如仇的故事时,忽然说道“鲁迅在1936年就去世了,这是他的幸运。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以他的性格和脾气,恐怕日子不会好过,说不定会成‘右派’。”^{②9}李慎之在给舒芜的信中也曾写道“鲁迅的最大幸运是只活到56岁,如果他能活到我们这个年纪,他的遭遇会怎么样,他的表现又会怎么样?这是每一个知道、尤其是敬爱鲁迅的人无不关心的问题。你熟识的乔冠华在1962年、胡乔木在1982年都曾对我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的话。然而鲁迅不是一般人,而

是特大的人物,他的命运,既要看权力者的政策和策略,也要看他自己的选择。我只能说,他在中国的威望比高尔基更大,性格也比高尔基更刚烈,下场恐怕只会比高尔基更惨。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的时候,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胡适毕竟是了解鲁迅的,他俩后来虽然倾向有所不同,但是,分析到最后,本质上都是中国最最珍爱自由的人。”^{③0}

五

随着“文革”的开始,“如果鲁迅活着……”的话题也广为流行起来。从正式公开的文字看,始作俑者又是郭沫若。在1966年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的大会上,他在题为《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中说:

鲁迅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

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为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为人所没有攀登过的高峰。”^{③1}

不得不说,已过古稀之年的郭沫若,想象力仍旧是令人惊叹。而据萧关鸿回忆,“文革”时,“在红卫兵小报上,就曾看到有人给党中央写信,要求追认鲁迅为中共党员,并且说,如果鲁迅活着,一定是文化革命的旗手,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③2}可见,并不是郭沫若一个人具有想象的智慧和能力,群众也有此觉悟。无独有偶,据周海婴回忆说“我记得,类似的这种拟想,在‘文革’初期,母亲就曾接到学生红卫兵的多封来信,也有径寄党中央的,叙述了许多的理由,要求追认并接纳鲁迅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③3}

面对这些假设,该如何做出理性回应呢?

首先,鲁迅是否会申请入党,是否会被批准入党?这个问题从鲁迅生前的表现看,应该不可能,因为他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最怕被限制、管束,所以他最终选择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他也曾在写给胡风的信中建议萧军不要加入“左联”。他说**“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③4}已经有了这样的心声与苦衷,在面对党的要义“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时,鲁迅又岂能申请作茧自缚呢?其次,如果鲁迅活着是否会成为“文化旗手”并直至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呢?鲁迅早在《关于知识阶级》中说过:**“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后来在北京去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 Yes, Yes, 那有什么趣味?”**^{③5}鲁迅不想做皇帝,当然更不想做“臣罪当诛今天皇圣明”式的奴才总管。鲁迅自己还说过“希望我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③6}试想,一个如此看透之人,会在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欣然“重操旧业”走上仕途么?

六

历史进入到1980年代。这一次提及“如果鲁迅活着……”话题的是绍兴一个普通中学教师章玉安。1980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诗歌《假如他还活着——献给敬

爱的鲁迅先生》。实在说,章玉安的这首诗是具有一定批判性的。如其中“才刚刚从狱中放出”一句,明白地指出,鲁迅如果活着是要被投入监狱的。这样的设想在1980年代初那个还不能随便谈论鲁迅的时代,的确是大胆且超越常轨的。但也要清楚一点,诗作是有应景之嫌的。即他所说的鲁迅被投入狱与“文革”中被投入监狱的大批“走资派”老干部的遭遇一样,是“四人帮”和“极左”政治迫害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章玉安的批判是配合或迎合了主流政治的批判大潮,仍属于当年“伤痕—反思”的主流话语,亦如巴金式的《随想录》一样。当然,章玉安的诗作还有一些内容值得思考。如鲁迅“决不会盛气凌人地昂首阔步”;“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决不用窗帘把路边的一切挡住”;“会把手伸向每一个流浪者,他要静听读了很多书的待业青年的倾诉……”这样的设想,矛头所针对的是1980年代初特权阶级在改革开放的名义下原形毕露、趾高气昂的景象,也部分地呈现出鲁迅平民本色和为民众代言的角色。特别是结尾两句“但也许——正在弹毫针砭时弊世瘤”,“但也许——正在经历着新的不安与愤怒……”,比较逼真地刻画出鲁迅的本真面目和鲁迅存在的意义。至于诗作者的其他种种设想,例如“身居高位”、“种种荣誉”、“不再用那张印花包裹去装他的讲义”、“出席一些重要会议”、“坐上了现代化的轿车”、“洒墨讴歌‘新的生活’”、“有了较多的欢愉和喜笑”等,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也存在可能,但如果真正了解鲁迅同时又熟知那段历史中的一幕幕闹剧和悲剧,即便是所谓“文革”结束了,但是面对一个没有真正反省和检视“文革”灾难的国度,面对一个“乱离人,不及太平犬”和“暂时坐稳奴隶”的社会现状,一切似乎应该有答案了。因为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过:“他(指知识者——引者注)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

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③7}

七

进入1990年代以来,告别革命、消解崇高、解构启蒙、谄媚大众、拒绝底线、浅薄庸俗等中国特色的景观成为社会的主色调,“知识分子在‘欲望的旗帜’下的精神溃败”^{③8}之时“如果鲁迅活着的”话题再次被提及。

2000年王朔在《收获》第2期撰文《我看鲁迅》,文中不无戏谑地写这样道“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给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无独有偶,2003年敬文东在《失败的偶像》中还说:“假如鲁迅在今天突然从上海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园里坐起来,看到到处滚动的都是小鲁迅,到处都是有关他的传说,也看到他曾经视为‘论敌’的那么多人都突然调过头来争相歌颂他,素有怀疑癖好的鲁迅该会作何感想呢?”^{③9}客观说,一方面,王朔、敬文东部分地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目下的鲁研界,的确混杂着不少自命鲁迅研究专家、学者的人,他们以研究和传播鲁迅为己任,并且声称离不开鲁迅,还以鲁迅为精神导师、人生标杆,然而只要认真检点其招牌下的货色,便会发现,背离、误读和曲解鲁迅,正是这些人的职业和兴趣所在;另一方面,王朔并非学界中人,对鲁迅研究界真正学人的研究不熟悉,大概只看了那些官样文章,所以出言莽撞、无知些;而敬文东则犯了以偏概全、打击面过大的问题。

新世纪之初,学界中出现了一股“抬胡贬鲁”^{④0}的思潮。这其中,谢泳曾这样问道:“就鲁迅和胡适两个人来说,我要先问一下,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④1}这样比较私人的问题,我们不好去争论谁选择谁。因

为,即便是更多人选择了胡适,也不能证明鲁迅“失道寡助”,正如那句名言:“世界上最有力量的那个人正是最孤立的人”。事实上,鲁迅与胡适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两面旗帜,两者的作用都是巨大而无可替代的,无论是在过往还是当下。此二人在世纪末的被提出、被选择,实则是当下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其实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或作出正确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个人对当下社会的判断,如果认为目前是一个政治基本面是良性的、可改造的社会,那么选择胡适就会成为更明智的选择,亦如胡适当年认为国民政府终将要走向宪政一样,所以他去“补台”、做诤友;而反之,就应该选择鲁迅去“拆台”。否则,前提判断错误,是有可能像贾府的焦大一样,即使是提建设性的意见也要被灌一嘴马粪,或者助纣为虐也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篇题名为《假如鲁迅去过苏联》的文章颇引人注目。作者吴蓉晖在文中这样写道“我们当然可以把先生对苏联的溢美之词归因于他未曾去过苏联。可是我突发奇想:假如鲁迅去过苏联呢?他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文字呢?”作者还为此设想了萧伯纳的大唱颂歌式、纪德的无情揭露式和罗曼·罗兰的明哲保身式三个样板,并为此总结道:“没有去过苏联真是先生的万幸啊!”^{④2}其实,如果认真考察鲁迅的过往行为,是不必为此纠结的。如鲁迅起初想往广东的革命,然到那里后看见革命策源地的种种旧气象,于是作《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革命时代的文学》。至于后来眼见了青年被抓而又解救无效时,便愤然辞职,然后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扣丝杂感》,并且还说过“知识阶级将怎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④3}可

见,鲁迅此前虽然也曾向往苏联,但如果知道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了解了种种宣传的假象,他决不会像萧伯纳或罗曼·罗兰那样,而会选择做纪德。

陈漱渝的《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文章在 2005 年曾引起热议。作者说,自己曾被一位台湾学者问过一个问题“如果鲁迅活到今天,来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中华民国,将会有什么感想?”陈先生回来后便撰文提及此事,并有所针对地写道:如果鲁迅活到今天,“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栓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肯定会含笑于九泉”,“也会对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表示忧虑和关注”,对当下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监督意识”“自然会持肯定态度”,对“两个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肯定会不以为然”,等等。^{④④}这些诸多假设,该如何去看待?其实,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理论的问题,不过是“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等探索性的话语表述,尚缺乏成熟理论。所谓成绩,如果相比于晚清新政时期,甚至战乱不断中间又历经世界经济大萧条的 1927—1937 年,是不足以如此夸耀的。同时,还要注意到,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环境的巨大破坏、贫富的极大差距、公平的严重践踏、道德的极度缺失、理想的整体溃灭,还有持续不断的高通胀^{④⑤},明目张胆地吞噬着民众的财富。所有这些,政府官员可以视而不见,但鲁迅一旦知情,那他就不会“欢欣鼓舞”。因为他说过“中国人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

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浮肿,与众不同。”^{④⑥}当然,鲁迅还说过:“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④⑦}

有关“如果鲁迅活着……”的话题其实还远未全尽,行文所限,也只能姑且说到此。当然,像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话题,今后也将还会再有。朱正说“其实,‘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它多次被知名的和不甚知名的人提出过。它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每一次提出都是十分具体地联系着当时的‘今天’的现实。”^{④⑧}朱正还说“《创世纪》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其实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上帝。当人们谈论‘要是鲁迅还活着’会怎样的时候,说的其实是他自己会怎样吧。”^{④⑨}这一点,在萧关鸿那里得到呼应“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断重复地提出这个假设?假设是相同的,每个年代的内涵却不同;每个年代的关注点不同,实质都一样。与其说是关心鲁迅的命运,不如说是关心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命运。只要问题没有解决,就会有人出来‘假设’。以鲁迅来假设,只是壮胆而已。”^{⑤①}黄宗江更是宣称“只要世上还存在着虚伪的‘瞒和骗’,那么鲁迅就仍然活着;只要世上还存在着思想专制和精神暴力,那么鲁迅就仍然活着;只要世上还存在着愚昧、迷信、奴才相,那么鲁迅就仍然活着。因为一切虚伪、专制、愚昧、奴才相和反人道、扼杀人性的刽子手,都是鲁迅的不共戴天的死敌。”^{⑤②}或者如鲁迅自己所说“好像华盖运还没有交完,仍旧不得舒服。”^{⑤③}

注 释:

① 《胡风全集》第 2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70 页。

②③⑤⑦ 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合集》8,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65、56、182 页。

- ④ 《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天涯》1996年第2期《殖民地鲁迅和他的仇恨政治学》，《书屋》2001年第5期《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中国站起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和《中国的疼痛》，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失败的偶像 重读鲁迅》，花城出版社2003年《赵无眠辣说历史——二十世纪的汉奸们》，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
- ⑤⑥④⑥ 《鲁迅大合集》10，第252、251、222页。
- ⑦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19—421页。
- ⑧ 《胡适全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63页。
- ⑨ 《鲁迅大合集》5，第145页。
- ⑩②⑥③②④⑧⑨⑤⑤① 陈明远编《假如鲁迅活着》，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281—282、1—184、8、172、231、9、299页。
- ⑪⑫⑬⑭⑮⑯⑰ 《鲁迅大合集》4，第245、242、279、242、207、208、208页。
- ⑬⑭⑮ 《鲁迅的全集》9，第201、298、206页。
- ⑭ 《人与人——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页。
- ⑮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4月2日。
- ⑯ 参见拙作《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 ⑰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 ⑱ 包子衍、袁绍发编《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 ⑳㉑ 《毛泽东文集》7，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263页。
- ㉒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内部资料，第179页；谢泳在2002年第6期《文史精华》载文

《对“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的理解》引证此资料，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记录的文字与此有出入。

- ㉓③④⑦ 《鲁迅大合集》3，第98、84、370页。
- ㉔③ 《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70—371、371页。
- ㉕ 韦韬、陈小曼《我的父亲茅盾》，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 ㉖ 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书屋》2001年第5期。
- ㉗ 《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0日。
- ㉘ 于沐阳《知识分子的精神裂变——以《山里的花儿》、《沧浪之水》等为考察对象》，《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 ㉙ 敬文东《失败的偶像 重读鲁迅》，第3页。
- ㉚ 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书屋》2001年第5期；谢泳《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邵建《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韩石山《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版等。
- ㉛⑫ 谢泳编《鲁迅还是胡适》，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301—303页。
- ㉜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 ㉝ 据权威数据，2007—2011年间中国大陆GDP增长率约为10.1%，但扣除CPI增长的4.8%，实际增长率也就5%。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研究报告，2006年1月至2010年5月间，CPI被人为调整，系统性低估超过7%。

(作者通讯处：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邮编：300074)